

中和和尚中国

李哲良·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李拾復 著

中國和尚

中

中

國

和

尚

國

和

尚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张问渔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刘 民

技术设计：何 华

中国和尚

李哲良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 3 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15.5 插页 3 字数 350 千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220-03719-8/G·703 印数：1-8000 册

定价：19.50 元

自序

当释迦牟尼在中印度点燃了“亚洲之光”以后，一股散发着智慧和慈悲的汩汩甘露，便一直滋润着人们的心田。而使佛光法雨得以沐浴全球的，除佛法之外，就是佛陀的弟子们，故人们称“佛、法、僧”为“三宝”。

所谓“僧”，就是指以比丘和比丘尼为基干的僧团。如果没有比丘和比丘尼的弘法，那佛教的住世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，而只剩下哲理上的文化价值了。

因此，释迦成道之后，就很注意对僧人的接收和培养。他首先度化的是最初随同他出家修道的五个侍从，这就是最早的比丘，即“五比丘”。后来，佛陀又陆续收了成千上万的弟子，由此组成了庞大的僧团，通称为比丘。

比丘是梵文的音译，“乞士”的意思。就是上从如来乞求佛

法而养育法身之慧命，下向众生乞求衣食以存活色身之生命，故叫“乞士”。女的则称为“乞士女”，通称为“比丘尼”。

佛教传来中国后，由于当时官方明文规定，说“佛，外国之神，非诸华所应祠奉”。因此只准“西域人得立寺都邑，以奉其神”，而“汉人皆不出家”。

汉魏时期，都是如此。直到曹魏嘉平年间（249—253），约三世纪时，颍川的朱士行才冲破了这条防线；第一个削发出家，成为中国最早的僧人。由于他打开了这个缺口，所以后来才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了大批的中国僧侶。

二

不过，中国僧人最初不叫和尚，而通称为“僧侶”、“僧人”或“比丘”、“沙门”……

佛教北传于疏勒（今新疆喀什市）、于阗（今新疆和田一带）等地时，根据印度俗语，呼老师为和社、和闍，当时便由此而呼僧人为和社、和闍（音译）。

后来，汉地又根据这个译音沿译为和尚、和上。梵文的意思是“近诵”，说“以弟子年少，不离于师，常逐近受经而诵也”。

可见，和尚原是指有学问的僧人、亲教师，是出家人对师傅的尊称，一般出家人则称为沙门。

律家多用“和上”，其余则常用“和尚”。

和尚，正式形成书面语言，最初出现在梁慧皎写的《高僧传》中，《鸠摩罗什传》云：

盘头达多是鸠摩罗什的启蒙老师，后来罗什学成了大乘禅法，又回来劝老师也学习大乘。

这时，盘头达多对罗什说：“和上是我大乘师，我是和上小

乘师矣。”

后来，在《晋书·佛图澄传》的正史中，即正式出现了和上写为和尚。

法常与法佐对车夜谈，言及和尚。

比旦，入见澄。澄已知之。

于是，国人每相语曰：“莫起恶心，和尚知汝。”

后来，又有“大和尚”之说。最早见于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，云：

（佛图澄）后为石勒所宗信，号为大和尚。……

所谓“大和尚”，也就是后来所说的“国师”。

由此可见，不论是“和上”还是“和尚”，抑或是“大和尚”，都是对出家人的尊称。

三

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弟子见了师父或学人去参拜老师，见面都以“和尚”称之。

老师问：“今天你来干什么？”

弟子便说：“请和尚指示心要。”

苏东坡见到佛印禅师时，除了偶尔叫“印老”之外，一般都直呼为“和尚”。佛印则叫他是“学士”。

叫的人顺口，听的人心安，犹见亲切，格外随和，并无轻视、陌生之感。

那种动不动就叫“方丈”、“长老”、“法师”、“大师”……听

起来很悦耳，但实际上并非都是出自真诚的尊敬，反倒显得陌生而疏远。正如今人叫“某某长”、“某某官”一样，看似尊称，实际上未见得就是尊敬你，说不定还带有某种嘲弄之意。但有些“长”字号们，却不明其意，反倒心安理得，自我陶醉。如果不呼其职称，或者把本有的“副”字加上，他听了就老大不高兴，还认为你不尊敬他。

这是世俗之见，不去说它。

但令人不解的是，今之佛法中也有此俗套。凡见尊者，不管他是不是方丈、长老、高僧、大德，都要以“法师”、“大师”、“长老”而呼之。这自然也是不错的。

叫者顺口，听者乐意。

若呼“师父”，倘叫“和尚”，恐怕就有点大煞风景了。

笔者也未能免俗，凡去朝庙或开会碰到僧人时，也浑叫“法师”、“大师”。

有一次，不小心叫成了“和尚”，对方就有一些不自在。因此，从那以后便一律叫“大师”。

至于对年轻的尼姑，则更愁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称呼。有一次，在一个寺里“随缘”进斋，席间有一位年轻的尼姑，是尼众院刚毕业的高材生，十分热情而洒脱。但我怎么也不知该称呼她什么才合适，叫“尼姑”肯定不行，称“师太”也不行，呼“师姑”也勉强。最后，只好说“你”呀、“我”呀，胡乱应付……

但我在完成书稿时，却在扉页上正式写了四个大字：“中国——和——尚”。把我对僧人的崇敬之情，都倾注其中了。

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和尚都值得尊敬，我也不以为出家就是人生的最佳选择。即使出家修道，也不一定非躲在深山古寺不可。至于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的高级和尚；成天忙于争名夺位，

与高官巨富拉拉扯扯的僧侶；更有一些恶僧、妖僧之流，那就非但不值得尊敬，而且大为可鄙、可憎了。

因此，本书所评介的和尚，大抵是经过挑选的。虽然不能说都是尽善尽美的高僧大德，但他们大多是各个时期颇有代表性的宗师，或为一方宗主。其中，特别是宋代部分，鉴于当时的情况，所选录的差不多都是有名的禅师。但与将出版的《中国禅师》并不重复，因为《中国禅师》只写到晚唐五代就结束了，并未涉及宋代以后的禅师。

和尚不一定都是禅师，但禅师却可以称为和尚。事实上，两宋以后的禅师，也不是单纯的禅师了，而是搞“禅净双修”、乃至“三教并行”的和尚，且越来越向世俗化靠拢。所以，将他们归于和尚之列，想来也错不到那里去吧？

四

东晋高僧道安说过：“不依国主，则法事难立。”这不仅是他的个人经验之谈，而且也为广大僧尼所信奉。

事实也是如此。佛教自传来中国之后，一开始就和“国主”结下不解之缘。

汉明帝梦佛求法的这一传说，尽管带有神秘成份，而且至今尚有争议，但事实上这一传说，已成为印度佛教东来华夏的“源点”。也就是说，外来佛教竟是因一个中国皇帝的梦而被迎请到中国来的。

从此，中国历代皇帝，大多把外来高僧当成贵宾来看待，同时也将国内的大和尚视为国师，并以师礼待之。

可以说，一部中国佛教史，皇帝与和尚竟占去了相当大的篇幅。因此，中国佛教曾一度成为上层统治者的皇家文化，而且自

始至终都抹上强烈的政治色彩。

除此之外，那就是中国佛教始终充满了文人士大夫的浓郁气氛。凡是有名的文人士大夫，没有不和佛教发生联系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大多与和尚结缘。在他们的人格结构中，始终都带有佛文化传统“基因”。从另一面看，和尚也离不开皇帝和文人士大夫。

因此，如果离开了皇帝和文人士大夫的话，那么，就很难全面透视中国和尚的风貌。

僧俗不二，凡圣同一。

在某种意义上说来，有些皇帝和文人士大夫，似乎可以说，他们本身就是另一类型的中国和尚，或者说是套上龙袍和官服的僧侣。正如清世祖顺治帝说的：“吾本西方一衲子，如何落在帝王家。只因当年一念差，黄袍换却紫袈裟。”（有人说这是他的儿子康熙帝写的）

这是人生的“错位”，也许是命运的安排。

他们虽然当了皇帝和文人士大夫，但善根犹在，佛缘未了，因此仍然企盼着“本位”的回归。所以，在黄袍和官服包裹下的依旧是一颗佛子之心。

有鉴于此，故在本书中也将他们融入到“中国和尚”的描述之中，尽管他们不一定都是和尚，但通过他们与中国和尚的特殊关系，即可从另一个角度和另一个层面，窥视出中国和尚的人格精神面貌及其深远的社会影响。事实上，中国和尚和中国皇帝及其文人士大夫的这种关系，已经很难分开了。谈论中国和尚，若不涉及到这个社会局面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这里，应当说明的是，有些人物，如中国皇帝中的隋文帝杨坚、文人士大夫中的王维等，他们都与僧尼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本

该一一收录，但由于笔者已在其它著作中提到过了，再加上本书篇幅有限，也不追求面面俱到，所以除了个别重复之外，其余一律从略了。

至于在写法上，主要是从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本着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的原则，不求统一，故有长有短，有大有小。但都力求雅中见俗，俗中见雅。

佛教，从释迦牟尼传教开始，就很强调佛教的通俗性。当时有个叫白世修的信徒对释迦牟尼说：“今比丘众，异名、异姓、异生、异族而来出家，各以俗语污损佛说。”他要求用“阐陀达”（雅言）来弘扬佛法。

释迦牟尼听了，当即就批评了他，说：“不应以阐陀达（来宣讲）佛说，（应）听随国俗音学习佛说。”他坚持并要求门徒采用平民百姓乐于接受的通俗形式来传播佛法。

因此，梵文经书的原本，大多通俗流畅，但将梵文译成汉文后，译文反而不及原文顺口也，也不容易“还原”。

这样，不仅经书难懂，而且不少僧史佛史也不容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。

所以，佛教文化也面临着如何深入世俗社会，力求既高雅又通俗的大众化问题。而大众化又不等低俗化，世俗化也不就是庸俗化。因此，将佛教文化通俗化时，就应与一般的俗讲和故事、随笔和札记等，有所不同。它应当在注重有故事、有情趣、有思想、有品位的同时，还应当有文化背景、有历史的厚重感和佛教特有的语境及氛围。

在物质生活中普遍缺乏的是文化，而在文化中普遍缺乏的又是文明的时代，佛家更应当走出深山古寺，面对现实人生，以平常的姿态走进寻常百姓之家，成为大众所需要和对人类终极关怀

的一种佛文化人格，真正起到净化人生、有益于社会进步的“有效”作用。

在这方面，笔者也是初开法门，仅从“大文化”的角度和“大众化”的形式，对此作些探索和尝试。因此，粗疏和失误，在所难免，还望读者和方家，不吝开示。

是为序！

李 哲 良

一九九七年春于重庆蜗居“竹林堂”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自 序..... | (1) |
| 鸠摩罗什的到来..... | (1) |
| 来自西域的大和尚——佛图澄..... | (9) |
| 乱世高僧——道安 | (20) |
| 虎溪三笑——慧远 | (31) |
| 佛光初照南北朝——僧朗 | (39) |
| 南山上表托武后——道宣 | (44) |
| 三车和尚——窥基 | (50) |
| 女皇身边的和尚们 | (56) |
| 香山居士的佛缘——道林、惟宽 | (77) |
| 唐朝的三个怪和尚——丰干、拾得、寒山 | (90) |
| 黄袍袈裟——佛光王与惠能、僧伽大和尚..... | (104) |
| 善与佛——普愿..... | (115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唐宣宗当和尚的时候——智闲、齐安 | (120) |
| 宫门佛子——不空、神会、慧忠 | (125) |
| “得得来和尚”——贯休 | (138) |
| 从小皇帝到大和尚 | (147) |
| 居讷禅师与欧阳修 | (150) |
| 佛印和尚与苏东坡 | (160) |
| 黄龙三关——慧南 | (174) |
| 不风流处亦风流——守端 | (185) |
| 门外春来草自青——祖心 | (194) |
| 白莲池畔社中人——常总 | (204) |
| 在红尘中勘破红尘——克文 | (212) |
| 此生永与世相违——慧洪 | (220) |
| 在欲而行禅——从悦与清素 | (232) |
| 家家有路透长安——文准和果禅师 | (243) |
| 为怜松竹引清风——法演 | (253) |
| 只许佳人独自知——克勤 | (262) |
| 佛眼慧光——清远 | (275) |
| 林上烟浓花正红——慧勤 | (283) |
| 几个男儿是丈夫——宗果 | (293) |
| 一川桃李自东风——原妙·明本 | (315) |
| 大家齐唱太平年——梵琦 | (322) |
| 从和尚到皇帝 | (329) |
| 从皇帝到和尚 | (342) |
| 一场充满佛光禅影的宫廷政变——道衍 | (355) |
| 红尘紫柏——真可 | (367) |
| 三教归一，一归何处——道恣 | (387) |

- 顺治帝与清初大和尚——通琇 (394)
苦瓜和尚——石涛 (401)
中兴禅宗的大德——云谷 (405)
洞庭波送一僧来——诗僧敬安 (414)
东方圣僧——虚云 (423)
滚滚红尘中的佛门龙象——太虚 (443)
当代佛学大师——印顺 (462)
- 附录：洋和尚照空（巨赞） (470)

鸠摩罗什的到来

伴随着汉地佛文化的流行，许多著名的西域高僧便源源不断地拥来汉地。他们既是作为弘扬佛法的僧人，又是作为外来文化移入的使者，同时大多又是中国皇帝请来的客人。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和最有成就的，恐怕当推鸠摩罗什了，但他由于偶犯“色戒”而险些身败名裂。

—

鸠摩罗什（343—413），龟兹（今新疆库车县）人。他的父亲名叫鸠摩罗炎，是印度的婆罗门族的后裔，本可以世袭高位，但他却偏要出家当和尚。后来，他东度葱岭，被龟兹王迎为国师。

龟兹王有个妹妹，长得天仙般的飘逸，人又聪慧无比，美貌超群。许是宿世姻缘，一见到罗炎便爱得发疯，非嫁给他不可。好在当时当地和尚可以娶妻生子，于是他们就喜结良缘，不久便生了鸠摩罗什。

此名的意思是“童寿”，言其童稚之时，就具有老人的德慧。

罗什七岁时，便随母出家当了小沙弥。因过目不忘，又很勤奋，每天能背诵千偈经文，所以被誉为“神童”，受到人们的喜爱。

罗什十二岁时，同母亲一起去沙勒（今新疆喀什米尔市）国住了一年。沙勒王很喜欢罗什，特地为他举行了法会，请他升座讲经。

佛祖曾用过的“钵”，不知为什么流传到了沙勒国。但当时人们并不怎么看中，随便把钵摆在露天地。罗什稚气未脱，大概觉得好玩，便把钵捧来当作帽子戴在头上，到处乱跑。有人提醒他说：“这钵是石头做的，听说很重，你怎么能戴着它乱跑呢？”

罗什听了，心念一动，顿觉钵重千斤，竟压得他仆倒在地，再也戴不动它了。他很奇怪，为什么刚才还戴着它行走如飞，现在却又如此沉重？想了半天，他终于明白了。这是因为“心有分别，境乃不同”的缘故。这件事，对罗什的影响不小，使他认识到“心”的作用。

“心”，在一定条件下，能“度一切苦厄”，能战胜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。比如，一个人在危急之时，可以急中生智，充分发挥出他的内在潜能。或搬动胜于平时十倍的东西，或跨过架于万丈深渊之间的独木桥，等等。然而，一旦情况改变了，那怕是同样的人和事，他却再也不能做到了。这就是罗什悟出来的“心有分别，境乃不同”的道理。也就是佛家们常说的“境由心生”、“心量广大”。

更影响罗什的一件事，是他遇到了莎车国的王子须耶利苏摩。

苏摩是专弘大乘佛法的高僧大德，罗什听他讲《阿耨达经》。当他讲到“五蕴”（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）皆空时，罗什大吃一

惊，说：“一切都空了，那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？”

苏摩说：“万境皆空。空了才好为‘真人’腾出空间来，让他登堂入室。你也就可以照见自己的本来面目了，佛的智慧神光也就纷至沓来。这又有什么不好呢？罗什，你学佛不就是为了‘觉’，为了‘悟’吗？体自空寂，净智妙圆。那时，你就觉悟了，成佛了。懂么？”

会悟者不在言多，一言即可会心也。

罗什一听，如醍醐灌顶，当下顿悟，高兴地说：“吾昔学小乘，如人不识金，以石为妙耳。”从此，他弃小乘而改学大乘禅法，专攻“三论”（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和《十二门论》）。

罗什不仅自己改学大乘禅法，而且还教他的启蒙老师也学大乘禅法。他的老师欣然接受，并且说：“和上是我大乘师，我是和上小乘师矣。”当时，罗什才二十岁。可见古时学者风范是令人钦佩的。（和上是律家的叫法，其余则叫和尚）

也就在这时，罗什的母亲要到印度去。临行时，她要罗什把大乘禅法弘扬到“震旦”（中国）去，但又担心他会受到什么意外的伤害，因此一时犹豫不决。罗什则对母亲说：“学佛，本来就是为了众生的利益的，如果母亲护法深慈，能割不忍的深恩，答应我东往震旦弘法，孩儿就是身当炉镬之苦，也甘愿承当！”

罗什的母亲，终于答应了她的请求，也完成了自己的一桩心愿。但她的预感，却不幸而被言中。罗什为了来中原弘法，的确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，付出了更大更高的代价。

二

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（382），罗什的声名已越过葱岭，传到了中原。苻坚派吕光出兵龟兹，嘱咐他攻克龟兹后，务必把罗什